



撒尔塔：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 ——也谈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下）

在这篇文章的上部分中，我们探讨了Sart一词和中亚撒尔塔人的有关问题。在这一部分中，重点谈谈中亚撒尔塔民族与我国甘肃东乡族的关系。对此，我们试从两个方面探讨。

第一个方面：中亚撒尔塔人怎样到了甘肃？

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和东乡族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与蒙古军西征中亚后在今临夏、临洮、东乡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屯兵有关；二是与安西王阿难答驻守唐兀之地的军队有关；三是与撒尔塔人来东乡地区传教有关。对前二个途径，目前研究得比较充分，这里只补充有关的资料和新分析。对传教这个途径，尽管有研究，但不充分、不深入，这里拟作详细探讨。

公元1219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率师越阿拉亦岭往征撒尔塔乌勒百姓^①。柏朗嘉宾在他的《蒙古引记》中也提到鞑靼人所征服的地区有一个叫“撒尔塔”，并把它与契丹、萨拉森、木速弯、突厥弯等并列^②。这说明，蒙古人确曾征服了撒尔塔民族。在西征过程中，蒙古军每陷一城，都要将当地人编入军籍，还征集当地人组成单独的军队，派蒙古将官监督^③。但从中亚征集最多的，还是各种工匠和有技艺的人。在这些士兵和工匠中，当然包括大

① 道润梯步简译新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

②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引记、鲁布鲁光东引记》，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量的撒尔塔人,因为他们是花刺子模的主要居民。成吉思汗“征撒尔塔乌勒百姓凡七年”^①。于1225年回师蒙古,次年又率大军南下进攻西夏,曾到过甘肃的洮、河、宁三洲,这些地方在当时和以后成为蒙古军的屯兵和军事重地,蒙古军曾在这里频繁活动,有很多中亚籍士兵和工匠被留在这里经营,蒙古军队和回回人在这里的屯垦是贯穿于整个元代的。这些都是学术界公认的。这里所谓“回回”,如上篇所分析,是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的通称,其中包括大量撒尔塔人。因此,有很多撒尔塔人在临夏、临洮、东乡地区屯垦是肯定的。撒尔塔人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很发达,比蒙古人或其他民族更适合于屯田,对此,蒙古人也是早已了解的。所以,蒙古人把撒尔塔人留在这里戍边、屯垦、牧养就毫不奇怪了。这些人在蒙古将官的统治下,集中而居,开垦荒地,引水溉田,屯聚牧养,逐渐成为定居民。这是第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与驻守唐兀之地的蒙古宗王阿难答有关。所谓唐兀之地,拉施特说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居民大多是木速弯^②。实际上,唐兀是西夏的别称,其地包括今宁夏全部和陕西、甘肃的一部分,河州也在其境内。元朝建立后分封诸王,将唐兀之地分给安西王忙哥刺,他死后由其子阿难答承袭,拥有乃父的军队和地盘。据《史集》载,阿难答幼时被托付给一个名叫篾黑帖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穆斯林抚养。阿难答曾经使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③。我们推断,在阿难答的那支军队中,原来就有很多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如曾经抚养阿难答的那位穆斯林,是一个名叫篾黑帖儿·阿散的阿黑塔赤(马夫),他的原籍突厥斯坦,正是撒尔塔人活动的地方。另如《史集》所说,唐兀之地原本就有很多穆斯林。这些穆斯林是阿难答在军中推行伊斯兰教的依靠力量。在这些穆斯林中,肯定有不少撒尔塔人。以后阿难答因参与夺权斗争被杀,其部属与元中央政府矛盾激化,曾派兵数次征伐。直至元文宗时,阿难答的儿子月鲁·帖木儿还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刺板的”等“谋不轨”^④。所谓“畏兀僧”,无疑是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阿訇,这也说明阿难答的部属与新疆乃至中亚的穆斯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密关系,抑或是渊源关系。在阿难答死后,除了零星记载外,他的军队似乎去向不明。学术界普遍认为,阿难答军队中的中亚籍士兵和工匠以及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士兵,为了逃避征伐,免遭屠戮,可能逃到了东乡地区,东乡四面环水、偏僻闭塞、山高沟深的自然环境是他们避风的安全港湾。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笔者还以为,除了东乡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利于他们生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还有成吉思汗时期留下的撒尔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他们信仰相同,风习相近,有共同生活的基础。这也是吸引阿难答军队中那些中亚籍士兵和工匠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来源与中亚撒尔塔人来东乡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有关。在东乡族中,关于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阿拉伯、波斯、西域的传说很多,认为这些人来自东乡主要是从事传教活动。经分析,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传说比较可靠,可以作为撒尔塔人来东乡的佐证。

一是关于哈木则的传说。这个传说认为,在明初,有一个撒尔塔人名叫哈木则巴巴(巴巴,阿拉伯语,意为伊斯兰教士),率领四十个传教者来甘肃临夏一带传教。他们先到与东

① 见前注《蒙古秘史》。

②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第1版。

③ 见前注《史集》第二卷。

④ 见《元史》卷三十六,中华书局标点本。

乡毗邻的和政东南门外河坝（现有拱北遗址）举行祈祷仪式，尔后到东乡阿玛萨（今达板乡境内），约定四十个人分开到各地传教。他们分别的地点，一说为大树一带，一说在阿玛萨。在今大树乡境内有一个名叫“朶朶叉”的地方，意为“分别”、“分散”，据说是为了纪念这件事而取的。他们分开后，哈木则来到龙家兀拉（兀拉，东乡语，意为“山”，龙家兀拉在那勒索、坪庄二乡境内），在此修建了清真寺，作为传教基地。现民间流传着“先有大礼拜寺，后有河州城”的传说，这里的大礼拜寺，即指哈木则修的这座寺。现在龙家兀拉下有一“麦池光”，汉译作“寺沟”，据说也是为了纪念这座寺的建成而命名的。哈木则亡故后葬于龙家兀拉的一条岭上，这条岭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哈木则奴隆（奴隆，东乡语，即“山岭”），还在他的墓地修建了拱北（现有遗址），现经常有人前往謁，以示纪念。

与上述传说相关的情况有：第一，传说中认为哈木则是个撒尔塔人，有非凡的本领，精通阿拉伯、波斯文，能讲中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第二，他在东乡定居成家，生了五个儿子，他们后来被分为五个房头；今东乡纳纶光为第一房头；高山乡的萨勒、石拉起分别为二、三房头；大礼拜寺为第四房头；今临洮县红旗乡富业土、楚布拉光为第五房头（后迁走）。上述一些地方的东乡族至今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哈木则巴巴。第三，据调查，传说中的四十位传教者中，有十五位埋在东乡地区：哈木则在哈木则奴隆，胡康士在峡口，哈散在盘子光，比俩里在葡萄兀拉，朶勒在七个湾，阿哈麦德在郭尼光，昂巴斯在沙沟门，以斯俩给在科妥兀拉，哲俩来依里在西眉山，阿里阿塔在宝碌礞山，哲里在双拱北，穆乎引地尼在凤凰山，依玛目在朶达兀拉，达吾德在赤干坪，格板的在红山根。这些人名和埋葬地点都有一致的传说，并在其墓地修有拱北。第四，这些传教者携带的“色者勒”（凭据）、手抄《古兰经》、竹筒等物据说还完整地保存在一民户家中（有待于进一步查证）。第五，笔者于1986年去新疆莎车县考察伊斯兰教教派情况时，了解到此处有个麻札（墓地）叫“乞里坦麻札”，也叫“七个穆罕默德麻札”。“乞里坦”在维语中是“四十”的意思，与该麻札的来历有关。据麻札看守者介绍，关于这个麻札的来历，在一本名叫《路巴布里艾黑巴尔》的维文资料和另一本波斯文资料中均有详细记载。据载，在希古莱历850年（公元1446年，明英宗正统十年），从依拉提地方来了四十个苏非派传教士，到新疆叶尔羌（东乡族称“亚勒岗”，即今莎车县）从事苏非派的宗教功修。他们出发时，老师给了一个竹杖，吩咐他们在这个竹杖能够发芽的地方停下来。他们走到叶尔羌，在此埋下竹杖，果然发芽了，于是就留在了这里。以后这个地方就取名“乞里坦”。后来，他们中的七位亡于此地，葬在乞里坦。因为这七个人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穆罕默德，所以该麻札也叫“七个穆罕默德麻札”。这七人去世后，其他人就到了甘肃、宁夏一带。笔者认为，这两个传说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初步认定，哈木则等人就是到新疆叶尔羌传播苏非教义的四十位传教者，因为两个传说时间上大体一致，都是明初；人数上相等，都是四十位（来东乡的可能是三十三位，为了纪念去世的同伴，说成是四十位也不足为奇）；都有关于竹制器具的说法，只不过一个是竹杖，一个是竹筒。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如上所述，文献资料证明，去新疆传播苏非派教义的四十位传教士以后到了甘肃、宁夏，两相印证，足可说明关于哈木则等人来东乡传教的传说是可信的，并非捕风捉影，虚构而成。

关于这个传说还有一种说法。据马瓦札（自称系东乡族自治县坪庄乡韩则岭拱北当家人）最近在一封申请书中写到：我的祖先名叫哈木则巴巴，是古阿拉伯人。他是精通古代阿语、波斯语的大阿訇。由于这里信众的邀请，于元朝中期，即约公元1350年左右，率领五个儿子，

不远万里，翻山越岭，从沙特阿拉伯经新疆到达甘肃东乡地方传教。初到后，他云游兰州、临夏、东乡、榆中传教。后来根据当时穆斯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他本人同二儿子定居东乡韩则岭地方，现有后代约200户、1000多人；大儿子到东乡萨勒定居，现有后代约1000户左右，5000多人；三儿子到东乡县那楞沟定居，现有后代约200多户，850多人；四儿子到达板红吉桥定居，现后代失散；五儿子到榆中县马坡窑庄定居，后代在同治年后失散，部分现居广河县五户川和干坪沟一带，约200多人。这个说法与前一个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主要是哈木则的原住地、来中国的时间和人数。关于时间和人数，由于传说年代久远，且是口头相传，出现一些错讹是难免的。认为哈木则是阿拉伯人，有追求正统的心理因素，也有地理概念不清的问题，如说是从沙特阿拉伯来的，而当时根本没有这个地名。但也不排除哈木则是古阿拉伯人的可能性。对于两种说法不一致的地方，留待以后进一步查证。这里暂以前一种说法为主。

二是关于阿里阿答的传说。这个传说认为，在很早以前，从撒尔塔地方来了八个“赛义德”（意为主人、首领，是伊斯兰教对通过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传下的后裔的专称），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来到东乡的卜隆固定居下来。他逝世后，埋葬在今达板乡的赛罕坪上。卜隆固村的东乡族至今认为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

我们根据上述传说初步推断，来东乡地区的哈木则等人是中亚撒尔塔人，他们是经新疆来东乡地区的穆斯林中传播苏非教义的，以后定居于此，子孙繁衍至今。这说明，元末明初在东乡地区是有穆斯林的，而且他们就是中亚的撒尔塔人。首先，传说认为哈木则就是撒尔塔人，并且通晓中亚好几种语言，如果不在中亚生活，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这些人是苏非派传教士。在上述关于乞里坦麻札的传说中认为他们是苏非派，东乡族苏非派各门宦的穆斯林对这些人的拱北非常崇敬，可以说明他们是苏非派传教士。历史上，苏非派有觅地静修或传教的习惯，所以很多地方都留有他们传教的足迹，清初以来，阿拉伯、中亚一带的传教士经常在我国西北地区传播苏非教义就是一个明证。中亚是苏非派的故乡和大本营，尤其在十四世纪末，蒙古族后裔帖木儿建立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聘请苏非派神学家为其国师，使苏非派在中亚得到迅速发展。十五世纪，苏非派又在中亚乌孜别克王朝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到十五世纪后，“‘赛格里埃’（即哲赫忍耶，中亚苏非派的一个教团）教派在萨尔特人中就传播的很广”^①。苏非派在上述地方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宣传其教义，有可能派遣传教士往各地传教，与其毗邻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地区自不例外。从地理位置上讲，甘肃通过新疆与中亚相接，来往至为便利。在蒙古人西征中亚后，这条商道完全洞开，到中国之“不知名之商贾教士，尚不知凡几也”^②。从时间上看，苏非派在中亚取得统治地位与哈木则等人来东乡地区正好相衔接，而且当时的甘肃已经成为中国穆斯林的重要聚居区，他们来这里传教便不足为怪了。而且正因为如此，与其说他们是来传播伊斯兰教，倒不如说是到中国的穆斯林中传播苏非教义更为确切。第三，到甘肃后，按理应该在穆斯林最多的河西一带停留，但他们却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东乡，看来这是不合常理的，实际上大有道理。我们推断，他们可能

①〔俄〕尼·维·鲍戈亚大连斯基：《长城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转引自陈国光《新疆伊斯兰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

②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1986年重印本。

已经了解到东乡地区有中亚的撒尔塔人,与他们同乡同族,风习相同,语言相通,传教也更为便利,于是他们纷纷到东乡传教并定居,不复回首故国了。

来东乡地区的中亚撒尔塔人,还有一个渠道,就是通过经商来东乡定居。关于这一点,我们还缺乏有力证据,故不详述。

第二个方面:中亚撒尔塔人与东乡族有什么相同之处?

1. 民族自称。民族的自称是一个民族族源和历史的客观反映,对于研究其族源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东乡族自称“撒尔塔”,这表明,在东乡族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中,撒尔塔人是占了主要地位的。但对这一自称,无论是在解放后的民族识别中,还是在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中,都没有引起注意(只有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本民族学者才首次把这一自称同族源联系起来作了考察),以致于使这一术语作为民族名称的意义消失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外国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词。如N·鲍培在1955年出版的《阿尔泰语言学引论》中说:“散塔语使用于中国的甘肃省,更确切些说,Kaoho高河(导河,即今临夏市)以东。有些作者称这个语言为东乡语,但这是不很确切的。”^①虽然作者以后作了更正,认为还是把散塔语称为东乡语更合适,但这是因为我国民族学界的失误造成的。又如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田清波(Father An-toiue Mestaert)在《在甘肃西部蒙古的土族方言》(1946年海牙第2版)的序言中回忆说,他于1919年在鄂尔多斯南部的博如布日嘎苏遇见马鸿宾将军的军队的几名原籍为导河的伊斯兰教徒时,他们自称是散塔人,称自己的语言为散塔语(Sarta Kele)^②。《大英百科全书》也称东乡语为“桑塔语”^③。这里所说的“散塔”、“桑塔”,是Sarta的音转,这种音转现象在东乡语中是常见的,而且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Sarta变成“散塔”或“桑塔”,是东乡语几百年来同多种语言交流而产生的语音上的变异现象,其词根仍为Sart。

东乡族不仅自称撒尔塔,而且把它看得很神圣、很贵重。如在起誓时不轻易说“敝撒尔塔乃贖也”(即“我以撒尔塔的名义起誓”),因为这句誓言被看作是本民族最神圣的誓言,只有在正式场合和关系重大的问题时才能使用。众所周知,穆斯林的一个主要誓词是“我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但信仰虔诚的东乡族舍此而用撒尔塔,表明它在东乡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东乡族中,撒尔塔不仅仅是民族的自称,有时也用来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这与人们把中亚撒尔塔理解为“伊斯兰教徒”是一样的,表明这个术语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撒尔塔在当作这个意义使用时,主要针对回族、保安族、撒拉族,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以为,这大概是东乡族与这些民族毗邻而居,关系融洽,加上信仰的关系,久而久之,把他们也看作自己的同族人了,是以用撒尔塔来称呼他们。

为什么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把撒尔塔看得很神圣呢?道理很简单。中亚撒尔塔民族在蒙古人的打击下一蹶不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蒙古军队强征入伍,被迫离乡背井,来到遥远的东乡地区,为了保持民族本色,不致使后人对自己民族的来源一无所知,所以即使在他们

①转引自日本栗林均:《〈“东乡语词汇”蒙古书面语词索引〉序言》,载《东乡语论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②见前注日本栗林均文。

③转引自马国良、刘照雄:《东乡语研究》,载《东乡语论集》。

与别的民族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的情况下,也念念不忘民族自称,一代一代传了下来。这充分说明,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

2. 民族语言。语言是构成民族诸要素中最稳定、变化最慢的一个特征,它对于民族识别和族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蒙古族起了主要作用。对此,我们不敢苟同。首先,民族语言固然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语言和民族固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绝非整齐对应的关系。所以,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断定一个民族的来源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只有在考虑到各种因素,辅之以多种材料的情况下,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次,现代东乡语固然属蒙古语族语言,与同语族语言相比较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点。综合语言学家们的观点,这些特点主要是:在语言方面,元音比蒙古语多 ω 、 σ ,是卷舌音,且没有长短的对立;辅音多G、h、z、K。在语音方面还与突厥语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多小舌音和喉音,这是突厥语的特点^①。此外,东乡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很多借词,约占东乡语的百分之二十左右。除汉语借词外,还有一部分借自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些借词不尽是宗教用语,其中很多是日常生活用语,特别是突厥语借词更是如此。蒙古语学者一般认为,在蒙古书面语中保留了一些突厥语借词,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东乡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与蒙古语的突厥语借词有所不同,如“杏”、“鼠”、“墙”、“麻”、“石”、“城镇(集市)”、“雾”、“榔头”、“筷子”等。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突厥语借词不是近几十年内借入的,而是较早期就借用了。这些借词的情况表明,东乡族与操突厥语的民族很早就有过密切交往^②。一些语言研究者更进一步指出,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在东乡语中是底层语言,即这些借词实际上是东乡族原来的语言中保留下来的词汇^③。一些学者还认为,东乡族的先民原来操突厥语,后逐渐转用蒙古语族语言,所以其语言中较之同语族语言有较多的突厥语借词^④。从这些论述看,东乡族先民是操突厥语而非蒙古语的民族,这与中亚撒尔塔人是突厥语系的民族的观点也相吻合。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也只能得出东乡族先民是撒尔塔人的结论。至于东乡语中的波斯、阿拉伯语借词,一部分是宗教用语,另一部分也是中亚撒尔塔人曾借用的词汇,以后也被保留下来。第三,既然东乡族先民是操突厥语的中亚撒尔塔人,为什么后来又采用了蒙古语族语言呢?这大概是由东乡族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元朝是蒙古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反映在语言上,蒙古语是官方的和通用的语言,特别是在蒙古军中和屯戍区更是如此。被掳而来的中亚撒尔塔人和其他民族的士兵、工匠,其主要任务是为蒙古军服务,即使由他们单独组成的军队,也由蒙古将官统帅。他们要接受蒙古将领的指挥,与他们打交道,不学会蒙古语是很难想象的。同时,由于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境内的各民族分为四等,蒙古族为一等人,为了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和特权地位,一些人便学习蒙古语,假冒蒙古人,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地方都曾发生,引起元朝政府的注意。

① 李克郁:《浅析东乡族和裕固族的民族名称》,载《青海民族学会学术论文选辑》第二辑。

② 布和:《东乡语词汇初探》,载《东乡语论集》。

③ 见《东乡族自治县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④ 见前注李克郁文。

所以,当时的中亚撒尔塔人学习蒙古语也不足为奇。另外,现代东乡语与《蒙古秘史》中使用的蒙古语更为相似,这表明中亚撒尔塔人使用的是十四世纪以前的古蒙古语,以后没有与周围的蒙古族发生过关系。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东乡族先民不是蒙古族。我们推断,那些学会蒙古语的撒尔塔人在偏僻的东乡地区居住,与蒙古族没有任何来往,所以保留了古蒙古语的一些特征。由于他们只学会了蒙古语而没学会蒙古文字,其语言也没有较大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东乡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地理名称。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同样包含着历史,而且因其在词汇中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故常常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东乡族居住地主要有两类地名与其族源有关。一类是奇僻的、在东乡语中又没有任何意义的地名;一类是表示屯垦牧养的地名。这两类地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撒尔塔人由蒙古族将领统率在此屯垦戍边的历史真实。

在东乡族居住区有很多奇怪的地名,如伯勒克、考勒、毛毛、苏麦图、科妥、楚布拉、赤孜拉兀、苏马赤、乌麦斯、郭罗青、塔拉兀、布楞光、夫格青、哈卡叉、呼拉黑,等等。东乡人常常为此而感到困惑,因为在现代东乡语中这些地名没有任何意义。为了解开这个谜,有人作了考证,认为这些地名很多都与中亚的一些地名相对应。如:喷赤河(Panja,在锡尔河下游)本支光(在东乡),阿里玛图(Alimatu,在伊塞湖北)——阿里麻图(在东乡),乌浒水(Uhu,阿姆河别称)——乌户(在东乡),薛合里(Zhchty,在四儿忒斯坦)——者合里(在东乡),撒里普勒(Saripale,在布哈拉和萨马尔罕之间)——萨勒(在东乡),塔巴兰(Tabaran,在塔巴兰县)——达巴拉(在东乡),干土(Kantu)城(在毡的附近)——干土光(在东乡),纳伦(Narun)河(在吉尔吉斯境内)——纳伦光(在东乡),孔格勒(Kongures,在乌孜别克境内,即康里)——坑格勒(在东乡),呼罗珊(Khorosan,在阿姆河西南)——胡拉杜(在东乡)^①。笔者是同意这种观点的。马松龄说,撒尔塔人“所至之地带以原驻地名名之”^②。既然撒尔塔人有这个习惯,这就完全有可能了。其中如阿里麻图这个地名,可以断定就是撒尔塔人带来的中亚地名。据《元史》记载:“也罕的斤,匣刺鲁(哈刺鲁、葛逻禄)人。祖匣答尔密立以斡思坚国(费尔干那附近的小城)哈刺鲁军三千来归于太祖,又献牛、羊、马以万计。以千户从征回回诸国,又从睿宗及折别儿谿降河西诸城,后从攻临洮死焉。”^③1211年当蒙古军出现在七河北部时,该地区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哈刺鲁的阿尔斯兰汗归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降旨称他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④,张星娘曰:撒尔塔犹言大食也^⑤。此不确。实际上,Sartagtai即“撒尔塔民族的人”。蒙古人在表示某一人的所属民族时,往往在民族名称后加一“tai音。阿尔思兰汗归降后,其军队曾像回鹘军队一样,参加了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战争。十三世纪初,哈刺鲁的另一部分驻于阿里麻里,以后也归降成吉思汗,他们可能被分配到匣答尔密立属下。以后随成吉思汗南攻西下,到达临洮后死于此地,其属下部分人有可能留驻这一带,并以原驻地名名之,取名阿里麻土。关于阿里麻土,马通先生说此地名与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有关系,阿里

①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②马松龄:《现代之新疆民族》,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35年3卷9期。

③《元史》卷一三三。

④《史集》第一卷。

⑤张星娘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9月第1版。

麻土人在追根溯源时,说他们的先祖是从阿拉木图被签发来的,落居东乡后,仍以老家之名命名^①。不知此说本何,暂存疑。葛逻禄(哈刺鲁)是突厥之一部,在今东乡地区有个叫哈刺路赤的地名与之对应。在东乡语中,哈刺路是地名,“赤”是附加词,以后演变为哈刺路赤。所以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哈刺路的”,也可以理解为“哈刺路”。这个地名有可能是以前哈刺鲁人居住的地方。除了前述匿答尔密立到过东乡族居住的地方外,另有一支葛逻禄人也到过东乡附近地带,如塔不台率领的哈刺鲁军队结束了成吉思汗对金的战争后,“由河西、陇右入关陕”,而且在元朝时,大批哈刺鲁人入中国定居^②,其中一部分定居于战略要地的东乡地区也在情理之中。和中亚撒尔塔人一样,东乡族也有走到哪里就把原住地名带到那里的习惯,如东乡地区有六个名叫“萨勒”的地名,考其渊源,都是高山乡萨勒村人。这说明,此类地名就是中亚撒尔塔人带来的,是中亚地名在东乡地区的移置。还有一些地名的念法与突厥语音特征相近或相似,有可能是撒尔塔人用突厥语起的,由于语音的变化,现在的东乡族已不知它们的意思了。

在东乡族居住区,还有很多地名与手工业和镇戍、屯垦、牧养有关。与手工业有关的地名如:免古赤(银匠)、托木赤(铁匠)、依哈赤(碗匠)、阿婆赤(编织匠)、阿拉素池(皮革匠)、坎池赤(麻匠)等。这些地名都分布在东乡南北二岭上。一个地方如此均匀集中地分布着以同一行业性质命名的地名,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安排的。我们推断,这些地方可能就是蒙古人安排撒尔塔工匠的地方,这些地名就是这么来的。表示镇守的地名如:达鲁花臣、巴素赤、沙黑赤等,分别是蒙古语、突厥语和波斯语,都是“镇守官”、“镇守者”的意思。毫无疑问,它们是以官职名命名的,而且从三种语言命名官职看,表明东乡地区的镇守者可能是操突厥语的撒尔塔人以及波斯人。达鲁花赤是元朝官职,此职一般由蒙古人充任,在缺乏蒙古人时,允许“有根脚”(门第高贵)的色目人担任^③,回回人忽撒马丁就曾经担任过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④。由此推断,设在东乡地区的达鲁花赤可能是个撒尔塔人,他的任务是管理工匠和屯田事务等。他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难答任命的。与屯垦有关的地名如屯地、屯田、新屯地等,在考勒乡就有三个叫“屯田”的地名。这些地名表明,蒙古军确曾在此从事过屯田活动。与牧养有关的地名如郭尼光(羊沟)、夫格光(牛沟)等。东乡地区有一首花儿唱到:“金山银山的八宝山,鞑子们占下了草山。”这表明,蒙古人在东乡地区占下草山从事牧养,而兀拉阿臣(牧养人)皆由撒尔塔人担任,所以歌词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如果东乡族是蒙古人为主形成的,他们是不会把“鞑子”这个诬称强加于自己的。还有一些地名与元朝的制度有关,如:“他木赤”,这是“探马赤”的对音。探马赤是蒙古兵制,是由各部族组成的军队,主要任务是充当先锋,所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故也可作“镇戍官”用^⑤。这个地名表明蒙古军确曾在东

①马通:《今日苏联的东干族——访问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散记》,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

②陈高华:《元代的哈刺鲁人》,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单行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④《元史·世祖本纪》。

⑤引自《蒙古秘史》。

乡屯聚镇戍过。又如在东乡黄河古渡口有一个叫“扎木赤”的地方，道润梯布说《蒙古秘史》中的扎木赤即站户^①，站户即司驿者，掌管驿传的人。所以东乡的这个扎木赤为蒙古军设立的驿站（可能是水站）无疑。还有兀刺阿赤、八拉臣、哈刺赤等地名，分别是“管驿马的人”、“管财物的人”、“驿站上设置的守卫”的意思^②。从以上地名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东乡地区曾经是蒙古军的一个重要屯戍点，在蒙古或撒尔塔达鲁花赤的统领下，大批的撒尔塔士兵在这里为蒙古人屯垦、戍边、牧养，而撒尔塔工匠则随军服务。在屯戍军中还设了八拉臣，专门管理财物，提供后勤保障。蒙古军还在这里设了驿站，并配备了必要的守卫和管理驿马的人。东乡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印证了这个假说。东乡地区几乎是四面环水，中间隆起，居高临下，攻守自如，进可以攻吐蕃，退可以进中原，是扼制中西交通的咽喉地带，军事位置很有利，且境内川源地带土质肥沃，灌溉便利，山区水草丰美，是镇守戍边、屯聚牧养的好地方，因此把这里作为重要的屯戍点是完全可能的。

4. 遗传特征。对于东乡族是否在遗传特征上与中亚撒尔塔人有联系，可以从两方面推断。一是从分析东乡族的ABO血型分布和遗传距离入手，二是研究其体质的外部特征，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族源问题。

血型在种族起源和迁徙等人种学方面的研究中有重要价值。把血型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计算遗传距离的方法，借以判断历史上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人类学家正在尝试使用的一种新的方法的一部分，林耀华先生认为，这种方法是从生物学上解释人类进化中出现的各种变异情况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但采用这种方法时，应尽可能的采用各种证据^③。我们把这种方法引入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中，对于确定我们东乡族是以中亚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观点，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年来，在东乡族和有关民族血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帮助。我们先将有关成果列表于下^④。另外，刘桂枝同志通过调查有关民族的ABO血型，并参照有关医学文献报导的部分民族ABO血型调查资料，对西北七个民族的ABO血型分布点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对比分析，计算出他们的遗传距离，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将他的计算结果也一并列出。然后再辅之以其他材料加以研究。

根据刘桂枝同志对西北七个民族遗传距离的计算结果，东乡族与有关民族遗传距离的排列顺序是：

维吾尔族与东乡族：	0.0006
维吾尔族与保安族：	0.0018
东乡族与保安族：	0.0030
汉族与东乡族：	0.0098
蒙古族与维吾尔族：	0.0134
蒙古族与东乡族：	0.0182

①②参见《蒙古秘史》。

③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④此表主要根据两个材料编制：a. 刘桂枝：《西北地区七个民族ABO血型分布特点及分析》，载《西北民族学院自然科学学报》第11卷第1期，1990；b. 徐珉等：《甘肃东乡保安裕固三个民族的ABO血型分布》，载《人类学学报》第4卷第4期，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

东乡族与有关民族ABO血型统计表

序号	民族	人数	地区	血型 (%)				基因频率			民族指数	频数顺序
				A	B	O	AB	r	p	q		
1	东乡	512	甘肃	32.42	35.94	20.90	10.74	0.4772	0.2494	0.2734	0.92	B>A>O
2	维吾尔	1017	新疆	29.5	33.23	24.69	12.58	0.4971	0.2390	0.2639	0.98	B>A>O
3	蒙古	156	西北	23.72	31.41	37.8	7.69	0.6086	0.1718	0.2196	0.80	O>B>A
3—1	蒙古		甘肃	28.74	25.75	37.73						O>A>B
4	回		甘肃	25.38	33.08	37.69						O>B>A
5	汉		甘肃	27.13	30.90	32.52						O>B>A
6	藏	1017	甘肃 (甘南)	24.09	30.38	38.35	7.18	0.6192	0.2098		0.83	O>B>A

藏族与东乡族: 0.0208

东乡族与裕固族: 0.0378^①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 第一, 东乡族与维吾尔族的ABO血型分布特点完全一致, 频数顺序同是B>A>O, B型最高, O型最低, 民族指数均<1, 遗传距离最近。因为人类血型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遗传的, 并且不因环境而改变, 所以上述结果充分表明, 东乡族与维吾尔族有亲缘关系。第二, 据文献报导, 宁夏回族也是B型高的民族, 其q基因频率为0.2530^②, 与东乡族接近。这与历史记载和我们的推断相吻合, 因为他们同是以中亚人为主形成的。但东乡族与甘肃回族的ABO血型分布不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甘肃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更多地吸收了汉族和藏族的成份, 致使基因交流, 形成了O>B>A的血型分布, 这与历史记载也是较为吻合的。第三, 与汉、蒙古、藏、裕固族相比, 东乡族与保安族的遗传距离较近, 这也与史实相符。据研究, 保安族是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为主形成的^③。所谓色目人, 是元代对中亚各民族的统称。这与东乡族的来源基本一致。第四, 很长时期以来, 有些同志认为东乡族是以蒙古人为主形成的, 但从ABO血型分布看, 东乡族既不同于甘肃蒙古族(O>A>B), 也不同于西北蒙古族(O>B>A), 遗传距离很远。这就从遗传学的角度排出了蒙古族是东乡族形成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民族的可能性, 表明东乡族并不是以蒙古族为主形成的。

那么, 为什么东乡族与维吾尔族血缘关系接近呢? 首先, 两族没有通婚史。据报导, 东

①刘桂枝: 《西北地区七个民族ABO血型分布特点及分析》。

②袁义达等: 《宁夏回族红细胞血型的研究》, 载《人类学学报》第4卷第4期, 1985年。

③《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 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乡族的调查是在甘肃的东乡族自治县进行的, 受检512人三代均未有与外族通婚史^①, 且甘肃东乡族与新疆维吾尔族相距既远, 不可能通婚。这就排除了两族因通婚而形成的血缘关系接近的可能性, 两族血缘关系接近定有其他原因。第二, 中亚撒尔塔民族是以突厥人为主形成的突厥系民族, 而维吾尔族很早就是突厥的一支, 两族原来的人种底子相同, 血缘相近。第三, 突厥人原属蒙古人种, 进入中亚后, 人种渐趋变化, 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 并以突厥人为主, 形成了一个撒尔塔民族; 维吾尔族的先民回纥人原也是蒙古人种, 进入塔里木盆地和中亚后, 人种变异, 混有高加索类型特征^②。因此, 两族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的人种特征也是基本一致的。第四, 刘桂枝说, 东乡族原是突厥系统的, 其渊源同突厥有一定关系。这与我们推断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观点不谋而合。作为撒尔塔民族后裔的东乡族, 其血型与维吾尔族接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第五, 东乡族的先民撒尔塔人与维吾尔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公元840年回纥汗国被黠戛斯灭亡后, 一部迁往帕米尔高原以西, 称葱岭西回鹘。他们在中亚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后, 多次深入河中地, 推进了这一地区的突厥化过程, 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融入中亚撒尔塔民族中, 成为其组成部分, 在以后的交往中, 撒尔塔人也可能融入维吾尔族中。因此, 人们也用撒尔塔来称呼维吾尔族。以上说明, 东乡族与维吾尔族血缘关系接近是有历史原因的, 由此可以推断, 东乡族就是以中亚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

我们再来看看东乡族与中亚撒尔塔人在外部体质特征方面有什么相似之处, 借以判断两族的关系。如上篇所述, 中亚撒尔塔人体质方面的典型特征主要是: 高鼻, 深目, 多须, 眼球之色较浅, 发色淡黄, 等等。这些特征在东乡族中有明显表现。东乡族的体毛较发达, 特别是须发较浓, 卷发者较多, 眼窝深陷, 鼻梁较高, 有的鼻直而外出。成年男子的胡子黄(红)黑相间者较众, 其中有些为纯黄色。蓝眼睛的人也很多。东乡有个地名叫“苦格里”即源于此。“苦格”是东乡语, 汉译为“蓝”, “里”是明初在河州地区实行的里甲制度, 东乡共分九里, 苦格里即其一(后废)。这说明当时这个地方蓝眼睛的人很多, 现在的苦格里人的相貌也更类似中亚人。东乡人的上述特征与现在的中亚人, 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去上述国家访问归来的人亦常说他们之间很相象。东乡族还与维吾尔等民族很相似, 把东乡族误以为维吾尔族的事, 在日常生活和民族交往中也经常发生。但东乡族与蒙古族在外部特征上有很大差别, 有人曾试图在东乡族中找出有蒙古族特征的人, 结果在逢集日找了七八个集(约20天), 只看到一个妇女与蒙古族相似^③。我们认为, 由于中亚撒尔塔人长途迁徙, 特别是通过通婚、民族融合, 致使其人种变异, 体质特征发生了变化。但从今天东乡族的身上, 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原来在体质特征上的一些痕迹。这表明, 他们在遗传上有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

5. 文化传承。研究民族文化的承继关系, 以此来探讨民族的来源, 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从文化传承关系上, 也可以看出中亚撒尔塔人与东乡族有着渊源关系。试举几例:

①手工业技术。手工业是中亚撒尔塔人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上文提到的东乡地区地名

①徐珉等:《甘肃东乡保安裕固三个民族的ABO血型分布》。

②杨圣敏:《回纥人的种族特征试析——兼评维吾尔族与其先民回纥之区别》, 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③见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

所反映的手工业行业,如银匠、钉碗匠、铁匠等,都是中亚地区的传统行业,现在东乡族铁匠、钉碗匠使用的一些工具也与中亚撒马尔罕地区同行业的工具相似。有意义的是,东乡族的擀毡技术与中亚吉尔吉斯人的制毡术十分相似。吉尔吉斯人在制毡时“常群聚成一圆群,中间堆置羊毛,用长杆扑打,然后撕成小块,铺为两层,浇水使透之,以席卷之,席外缚绳。于是分为两群,各有十人光景,对面而立,甲方用右脚把席卷踢向乙方,乙方企踵以接,重复踢回来。如此踢来踢去,约费一点半钟,然后解开捆席的绳子,再由妇女捶打三小时,毡子才算告成。”^①制毡是东乡族的传统行业,东乡南、北二岭的制毡术闻名遐迩,他们制毡所使用的工具、方法、程序与吉尔吉斯人非常接近。我们知道,吉尔吉斯人早期的历史与匈奴、丁零、塞种、乌孙有密切联系,以后有大批突厥人以及葛逻禄、回鹘人加入,形成于中央亚细亚^②。他们的活动范围大体与撒尔塔人一致,有基本相同的族源,在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是常有的事。以后撒尔塔人把这种技术带到东乡并保留下来,这是非常可能的。

②商业文化。中亚撒尔塔人曾以长于商业而闻名于世,在古丝绸之路路上,继粟特人之后,执商业牛耳者就是撒尔塔人。东乡民族也善于经商,被视为擅长经商的民族。东乡族的商业活动主要是行商和转手买卖。这也与中亚撒尔塔人的经营方式相似。据《导河县志》载:“东乡多负贩。”所谓负贩即行商。解放前,东乡有所谓脚户,数量很大,他们主要从事远距离贩运,脚步遍及西北各省和内地。他们虽不识文断字,但却以诚实和能吃苦而远近闻名。在商业贸易受到鼓励的今天,东乡族发挥传统优势,男子普遍在外经商,经年不归者甚众。

③饮食文化。东乡族喜吃面食,尤其是油香、油果、馓子、酥馓等油炸食品,历史悠久,工艺考究,色香味俱全,是招待客人及馈赠之佳品。东乡族的这种食品结构是中亚农业文化类型的反映,也是中亚人的风味。东乡族的食物以炸、烙、烧、烤为主,民族学家一般把这种生计特征归为盆地草原游牧型和绿洲耕牧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乡族是来源于盆地草原和绿洲,而区别于蒙古族的戈壁草原游牧性生计特征。盆地草原和绿洲,正是中亚包括我国新疆一带的地貌特征。

④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遗传,具有承继性特征。东乡族至今还保留着中亚人的一些风俗。如苏湖图(突厥语,意为献纳食物)的习俗。它是在娶亲时,当主人的亲友娶亲跑过自己的家门时,主人要在门口路旁设置桌椅,摆上馓子、手抓羊肉等丰盛的食品,供娶亲队伍饮食。这种习俗在中亚一些地方也有。^⑤又如,在农历正月十五晚上,东乡一些地方的东乡族要聚在一起跳火堆、玩火把,并根据火的颜色来判断粮食丰收或歉收。在中亚,特别是在伊朗也盛行这种风俗,叫“瑞鲁兹。”^④这个习俗可能是拜火教的遗迹。拜火教曾盛行于中亚的粟特人、波斯人中,后来有些习俗被保留下来也是可能的。突厥也有崇拜火的

①〔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吉尔吉斯”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③马国忠、马自祥:《关于东乡族族源问题》,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④同①。

习俗^①。突厥是中亚撒尔塔人的来源之一,“事火”的习俗被保留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东乡族中拜火教的遗迹来自其它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中亚,是由中亚撒尔塔人带来的。

⑤姓氏来源。撒尔塔人是没有汉族姓氏的概念,直至现在,大部分东乡族群众对此也很淡薄,甚至有人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撒尔塔人来到东乡地区后,由于民族交往日益加深,才逐步采用了汉姓汉名。汉姓多源于他们原名的首字、尾字和中间的某一个字,所以就形成了脱、驼、牙、下、且、坡等奇僻的姓,这也是只有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东乡为什么有86种汉姓的原因。现在东乡族姓马、买、牙、下、胡、丁、妥、脱、驼、且、坡、巴、白、米、仓、龙、周、康、肖、瓦、吃、他、色的人,都自称是从西域来的撒尔塔人。其中的“康”姓很可能是康国人。《辞海》说康国在撒马尔罕一带,粟特原属康国,古代康居人和康国人来中国,有的就以康为姓。在著名的东乡族史诗《米拉尕黑》中,有一个叫康通巴咱的地方,巴咱是突厥语,意为集市、城镇,康通疑即康国。在成吉思汗攻打撒马尔罕时,城里的三万多康里人纳城投顺,并未遭到洗劫^②。这些人有可能到了东乡地区,以康为姓。黄文弼先生说:“居住在大夏河一带的土人(即东乡族)……大部分来自西域撒马尔罕一带。^③”所以这个康姓很可能就是撒马尔罕的康国(康居)人,十二三世纪的撒马尔罕就是撒尔塔人的一个中心城市。

通过上下两篇几个方面的探讨,我们初步认为,撒尔塔一词自流行于中亚以来,其意义多有变更,在十一世纪以后,它是确指一个民族实体的。这个民族是由西进的突厥诸部、中亚土著居民和波斯人、阿拉伯人融合而形成的。他们曾广泛活动于中亚一带,是花剌子模的主要居民之一。十三世纪由于成吉思汗西征的毁灭性打击,这个民族逐渐消失了。其中一部分随着成吉思汗用兵西夏和安西王屯兵唐兀之地而来到东乡地区,主要从事镇戍、屯耕、牧养等活动,以后逐渐转向定居生活。约在明初,又有一些中亚撒尔塔苏非派教士来东乡传播苏非教义并定居于此。东乡族就是以这些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一个民族。东乡族的自称、语言、地理名称、遗传特征、文化传承也都支持这个推论。由于我国民族学界一误再误,把中亚撒尔塔理解为回回,把东乡撒尔塔定名为东乡族,以后约定俗成,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致使撒尔塔这个词作为单一民族名称的意义消失了。这是应该给予澄清的。

(责任编辑:杨建军)

①李国香:《为维族神话一辨》,载《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②穆德全:《元西域花剌子模考》,载《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③转引自马福龙:《伊斯兰教在宁夏》载《西北通讯》2卷8期,1946年。